



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的浮粟泉遗址和“东坡书院”门匾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封烁 摄

旧址位于今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的琼州东坡书院，已被学界考证为目前海南有据可考的最早的书院，也是全国最早的“东坡书院”。
清代学者朱彝尊说过：“书院之设，莫盛于元。”琼州东坡书院正式纳入官办学校系统，正是在元代，而且设立了山长（即掌教）这一官方教职。
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陈定如，向您徐徐讲述海南这家最早的书院鲜为人知的过往。

宋代以前，海南被视为“炎荒绝域”，文化发展滞后，教育资源匮乏，除了创办于北宋时期的官办儒学外，尚无一所书院。始建于南宋末年的琼州东坡书院，是目前海南有文献可考的最早书院，元代正式设立“山长”一职，纳入官办体系。

琼州东坡书院不仅是对苏轼贬谪南行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，更是一种文化追认与精神传承。它以“东坡双泉”为地理与精神原点，将中原士人的道德理想与文学风骨植入琼崖大地，并以其“首所书院”的身份，成为海南书院教育史上的里程碑，具有无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。

同是天涯贬谪人 东坡双泉“房客”惠洪、李光

琼州东坡书院的前身“东坡双泉”，是苏轼贬谪海南时指示开凿的两眼甘泉。其故事不仅见于苏轼的《洞酌亭诗（并叙）》，更在后来的宋代文人惠洪与李光诗文中得以延续，成为连接东坡遗迹的重要纽带。

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，即苏轼自琼北归后的第十二年，名僧惠洪因受牵连被流放至朱崖军（今三亚）。次年（1112年）二月，他抵达海南后，在琼山县（今海口）暂住，受到知州张子修厚待，因体弱被安置在东坡双泉养病。在此期间，惠洪从当地父老口中详细听闻了苏轼开凿双泉的轶事：东坡曾言水中潜藏白龙，并果真目睹其形影，遂指示开井。惠洪将此奇闻记入《冷斋夜话》。

惠洪不仅记录了双泉的起源传说，更描绘了当时双泉周边的园林风貌。他在《送李仲元寄超然序》中提到，泉旁先建有“疏快堂”，堂后有“俱清轩”，知州张子修又在轩后新建了“至远庵”。园中种植橄榄、荔枝等树木，景致清雅。惠洪此时虽已无僧籍，却是首位入住至远庵的客人，其诗文成为后人了解北宋末年双泉景况的珍贵史料。他在此住了一两个月后，告别了张子修，即南下前往流放地。

宋绍兴十五年（1145年）九月，贬谪琼州的名臣李光应知州徐自然之邀，携子李孟坚迁居东坡双泉。他修整了旧有堂屋，次年自题匾额“转物”，并作《转物庵铭》。李光对居所甚为喜爱，在《双泉诗》中写道：“苏公经行地，亭宇稍葺整。方池湛寒碧，曾照东坡影。”表达了对苏轼的深切景仰。

李光从当地乡老处得知，苏轼曾题名“洞酌”并作诗，后来泉水被疏为三池，引水注入。50年过去，泉水依然清澈流淌（见李光《琼州双泉记》），但东坡诗题已不存。李光坚持寻访，最终在乡老朱景观处获得苏轼亲题的“洞酌亭”三字，大喜过望，立即按苏公原字重刻匾额悬于亭上，并手录苏公《洞酌亭诗》重刻，置于亭中。从李氏《琼州双泉记》中得知，现存浮粟泉“三池”的规模形制，早在南宋已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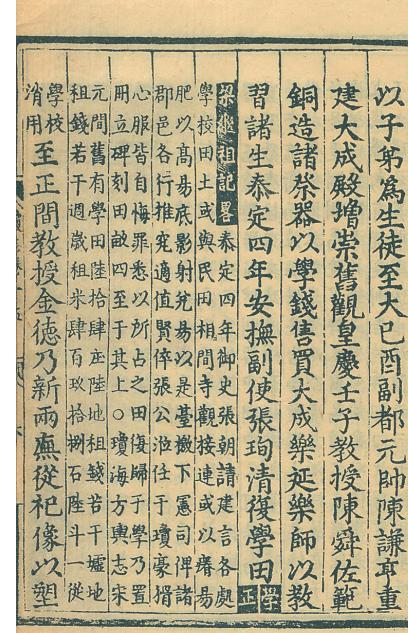
1940年代的海口苏公祠大门及“南溟奇甸”匾额。资料图

绍兴二十年（1150年）三月，李光再遭贬谪，移置儋州。临行前，他个人出资在泉上新建一亭，命名为“双泉亭”，并刻《双泉亭（并序）》诗于亭中，诗中写道：“懿石流沟汲愈新，秋无落叶早无尘。他年莫忘痴顽老，曾是双泉旧主人。”流露出对双泉的深厚感情和不舍。李光在琼期间待人亲和，体恤百姓，深得当地人敬重，离去时送行者众多，依依惜别。

惠洪与李光，这两位与东坡命运相似、先后流寓海南的宋代文人，通过他们的诗文，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东坡双泉的宝贵记录。虽然岁月流转，诗文呈现的双泉景象已显“朦胧”，但这些文字承载着对东坡的追忆与双泉风貌的片段，足以寄托后世无尽的遐思。他们的经历与文字，共同丰富了东坡双泉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苏轼北归后，为了纪念他，琼州人士在东坡双泉那里建起苏公祠。南宋晚期，这里创建起海南第一所书院——东坡书院，元、明、清时期先后续建，成就了许多人文佳话。

南宋末年的东坡书院，还不是教育场所，仅具有文化名胜和纪念的性质。南宋无名氏于咸淳八年（1227年）作《锦衣堂题名记》，文中将东坡书院简称为“坡院”：“邦之人士，以颖滨续坡翁诗有‘锦衣他日千人看’之句，就‘坡院’筑锦衣堂、聘丰碑以立进士名刻。”（正德《琼台志》转录）



“锦衣堂”名称来源于苏轼的弟弟苏辙著《栾城后集》，《集》中有《补子瞻赠唐佐秀才（并引）》，诗云：“生长茅间有异芳，风流移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管鱼龙窟，秀出羊城翰墨场。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目长。”宋崇宁初，苏轼的学生、琼山县人姜唐佐中举后，进京赴考时经过距琼州不远的汝南县，在那里见到了苏辙，姜唐佐将苏轼亲题的扇面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给苏辙看，那时距苏轼去世已过去一年多。感念流涕之下，苏辙为其兄二句扇题诗赠送给姜唐佐，诗中的“锦衣”象征着身份地位，亦为苏辙对姜唐佐的欣赏和肯定。

南宋的琼山乡绅自发在东坡书院旁建锦衣堂、聘丰碑，缘起于南宋末年的一起令世人瞩目的科举事件：琼山人郑真辅于宋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登进士，为探花使者，成为当时海南科举史上的一件盛事。《琼台志》卷三十八《进士》开篇记载：“琼在宋，四榜连破天荒，又继以年少探花，为人争艳。”郑真辅“最为年少，人争艳之”，震动岭南，意义非凡。所谓“四榜连破天荒”，意指自北宋至南宋末年，海南士子接连登第，打破了以往无人中进士的局面。

琼山乡绅借苏辙诗句之意，在东坡书院旁建“锦衣堂”，并立丰碑镌刻历代士人姓名，以彰荣耀。此举不仅是对苏氏兄弟文脉传承的追思，更是将百年前“他日千人看”的预言转化为现实荣光的回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有学者推测郑真辅出自东坡书院，但据《琼台志》中的按语可知，《锦衣堂题名记》所录进士皆属郡学（州学）体系，而南宋东坡书院尚未具备教学职能，故郑真辅并非书院学生。立碑之举实为地方士人借书院圣地，融纪念、激励与教化于一体的文化举措。

书院之设，莫盛于元 元代东坡书院进入官学体系

南宋晚期于东坡双泉处建东坡书院，已是官方旧志中的共识，是已知的海南古代书院中最早成立的书院。

刘伯骥的《广东书院制度沿革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39年铅印本）考证，广东省（含海南岛）的书院最早建于宋代，并将琼州东坡书院列入宋代广东各书院列表中，是海南唯一入列的一所书院。整个宋代，海南其他各州县均未设立书院。

“书院之设，莫盛于元。”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下诏：“凡先儒过化之地，名贤经行之所，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，并立为书院。”（《元史》）该诏令确立了元代鼓励官民共建书院的基本政策。同时，元代在路级行政区域推行“行省一路学一州学一县学”四级官学体系，在此背景下，由官府开办或主导的书院数量显著增加。

元代的东坡书院开始聘任山长时，年代不晚于延祐年间，其时隶属于琼州路军民安抚司，该司统领全岛诸军县，从行政级别上，“路”类似于明代的“府”。

元代的琼州东坡书院在地方长官的主持下首次置办有固定的书院田，在设书院山长时，必先通过官府考核推荐。

在《琼台志》的《秩官上·府·元·儒附职》中，琼州东坡书院山长名单赫然在目，该志将元代的琼州东坡书院任职人员设在“府”（即“路”级）的名录下，从这里看，书院山长确定为被正式选拔任用的儒职，该职务属于“府秩官”。

例如，琼州东坡（今攀丹村）人唐圃，举文学出身，被推荐任琼州东坡书院山长，后来由山长升任琼州路儒学教授；刘复初则是由万安军学官迁任琼州东坡书院山长；琼山符乙翁、唐孔宣则通过“荐辟”选拔为山长。成为山长后，还可以由“荐辟”升任其他公职，因此，琼州东坡书院山长的职位属性相当于当今社会常说的“正式编制”。

因此，从山长任命制和官职名录来看，元代琼州东坡书院是路（府）级书院，山长也是“路（府）级”待遇。

进入明代后，琼州东坡书院虽数次易名，但作为讲学、祭祀、传承儒学文化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，更成为海南士子学习经史、修身正心的重要场所。

自元代始书声琅琅、膏火不绝的琼州东坡书院，延续了东坡精神与教育传统，成为琼岛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。



画里梅花盼春归

■ 缪士毅
笔砚清玩

时下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——大寒，我国大江南北的梅花正次第绽放。名家画中那一棵棵惟妙惟肖的梅花，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宋代画家扬无咎的《四梅图》，元代画家吴镇的《梅花图》、王冕的《墨梅图》，明代画家陈录的《梅花图》、刘世儒的《墨梅图》，清代画家恽寿平的《梅花图页》、八大山人的《古梅图》、金农的《红绿梅花图》、浙江的《松石梅花图》、罗聘的《二色梅花图》、虚谷的《梅鹤图》，以及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的《梅石图》《绿梅通景图》，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万玉香雪》、张大千的《红梅图》等，不论是立轴、长卷，还是扇面、册页，不论是红梅、绿梅，还是墨梅、白梅，都带给人们以无限美的视觉享受，也为画坛增添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

历史上以绘梅为主题的画作无数，在画作表现上，梅花除了单独入画外，常与松、竹、兰、菊、水仙等相伴，或与有清物之名的湖石相佐，通过这些组合搭配，为梅花画作平添文化韵味，有的组合搭配成了世人喜爱的吉祥图案。

如梅与竹组合，梅花凌寒绽放，竹经冬不凋，两者代表坚韧高雅，结合在一起，为传统的“双清”图题材，象征清雅高洁，如明代徐渭的《梅竹图》，清代画家罗聘和石涛画过同题的《梅竹双清图》。

梅与水仙搭配，也是传统的“双清图”题材，如明代画家陈淳的《梅花水仙图》、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梅花水仙图》等；梅与松、竹搭配，即为传统的岁寒三友图，寓意吉祥，代表画作有明代画家徐渭的《三友图》、陈淳的《岁寒三友图》等；而有的梅画中，常出现鸟的身影，给画面增添动感，如明代孙克弘的《梅竹寒雀图扇页》，尤其是梅与喜鹊搭配，寓意“喜上眉梢”，如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梅花喜鹊图》。

此外，有的画家画梅时，喜欢将梅与雪、月搭配在一起，相得益彰。如宋代画家徐禹功的《雪中梅竹图》、明代画家戴进的《踏雪寻梅图》、清代画家汪士慎的《梅月图》等。

一些画家一生画梅不已，并形成了自己的画梅艺术风格。如元代画家王冕画梅花时，自辟町畦，独立门户，喜欢采用双勾法画梅花花朵，圆润细腻，别出新意，充分展现了其独具匠心的绘画艺术；清代画家罗聘以画梅最为突出，其画梅“不取人看颜色似”，不完全以形似为目的，重在胸臆的抒发，努力在绘画中做到两心相知，物我交融；近现代画家吴昌硕常以篆笔写梅花，所作梅花从骨子里便透着一股金石气。他画梅花时，借鉴了书法和篆刻上的章法布局，于是，画梅时喜欢取“之”字和“女”字形的格局，使画面显得虚实相生，主体得以突出。有趣的是，他谓画梅为“扫梅”，单这一个“扫”字就体现了画家画梅的特点，真可谓独辟蹊径。尤其是他画梅时，时常将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绝合而为一，融入创作之中，以致其梅花画作迥异于前人，堪称独树一帜。

“春为一岁首，梅占百花魁。”凛冬已至，梅花开了，春天也就不远了。何不在梅花氤氲的名家画集中，恭候春天的到来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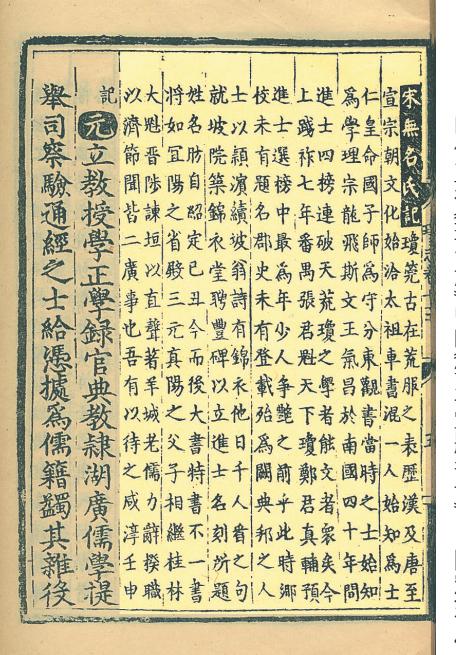


元代王冕的《南枝春早图》立轴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中的《锦衣堂题名记》。
陈定如供图